



徽学与地域文化丛书

乡土皖南的书写者

——吴组缃创作论

—— 黄书泉 著 ——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

徽学地域
文化丛书

乡土皖南的书写者

——吴组缃创作论

黄书泉 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安徽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土皖南的书写者:吴组缃创作论 / 黄书泉著.

—合肥:安徽大学出版社,2011.12

ISBN 978-7-5664-0309-4

I. ①乡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吴组缃(1908~1994)—
文学研究 IV. ①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93812 号

乡土皖南的书写者——吴组缃创作论

黄书泉 著

出版发行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安徽大学出版社
(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)
www.bnupg.com.cn
www.ahupress.com.cn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152mm×228mm
印 张:13
字 数:174千字
版 次:2011年12月第1版
印 次: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定 价:28.00元
ISBN 978-7-5664-0309-4

策划统筹:朱丽琴 刘 强
责任编辑:卢 坡

装帧设计:知耕书房
责任印制:陈 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:0551—5106311

外埠邮购电话:0551—5107716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:0551—5106311

徽学与地域文化丛书

编委会名单

编委会主任:吴春梅

编委会副主任: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卞利 张子侠 张能为 鲍恒

编委: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卞利 王国良 王达敏 王天根

王成兴 李霞 江小角 张子侠

张能为 张崇旺 张爱冰 张金铤

吴春梅 吴怀东 吴家荣 宛小平

陆建华 陈林 徐国利 鲍恒

目 录

CONTENTS

001 第一章 皖南乡村之子

——吴组缃生平事略

- 001 一 茂林山水育英才
- 003 二 家世与青少年时代
- 005 三 求学路上的良师益友
- 010 四 当上了冯玉祥的国文教师
- 015 五 “我还是适合于去教点书”
- 018 六 敢讲真话的狂狷之士
- 021 七 日常生活中的率真性情
- 023 八 无尽的思念

026 第二章 乡土经验的独特叙述

——吴组缃短篇小说中的皖南乡村与破产农民

- 027 一 写“我所熟悉的人与事”
- 031 二 美丽的自然,破败的乡村
- 035 三 旧中国乡村社会众生相 ——以《一千八百担》为例
- 042 四 苦难中挣扎的破产农民形象
- 049 五 乡村画卷的丹青高手

056 第三章 被压抑的精灵

——吴组缃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

057 一 “女鬼”:封建礼教的牺牲品

065 二 “为奴隶的母亲”

069 三 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

079 第四章 经典性的写作

——吴组缃短篇小说艺术经验

079 一 短篇小说与经典性写作

082 二 清醒而冷峻的现实主义艺术风貌

087 三 统一于“写人”的多样化叙事风格

089 四 独特而鲜明的结构和语言艺术

094 第五章 抗战文学的独特叙事文本

——吴组缃长篇小说《山洪》解读

095 一 乱世乡村的众生相

099 二 独特的国家观

103 三 一个农民的心灵史

108 四 短篇小说艺术特色的延续

113 五 半部好小说

117 第六章 散文小说化

——吴组缃散文创作论

117 一 吴组缃的散文观

120 二 窥现实一斑而见社会全貌

129 三 “创作散文很类似小说的写法”

133 四 吴组缃散文的当代意义

136 第七章 在左翼文学与乡土文学之间
——吴组缃在新文学史上的意义

- 137** 一 吴组缃与左翼文学
- 142** 二 吴组缃与乡土文学
- 147** 三 吴组缃在新文学史上的意义

154 第八章 另一种意义上的创作
——吴组缃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

- 155** 一 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真知灼见
- 157** 二 古典小说艺术经验的独特阐发
- 162** 三 情有独钟《红楼梦》
- 170** 四 从创作中来,到创作中去

175 附 录

- 175** 一 吴组缃小传
- 177** 二 吴组缃著作年表

197 后 记

第一章

皖南乡村之子

——吴组缃生平事略

一 茂林山水育英才

吴组缃于1908年4月5日出生于安徽泾县茂林镇。

泾县地处皖南山区，青山环绕，绿水逶迤，风光旖旎。东溪、古溪两水相抱之处有一镇，因泾县西南境内一片茂密的森林而成名，世称“茂林”。明嘉靖（1522—1566）间里人吴子孝作《茂林八景诗》，将《茂林乔木》列为八景之首，用“乔木千樟接大荒，饱含元气四时芳”的诗句描写了当时的景象。

传说茂林曾为古代“山越”所居，后因战乱而绝迹。茂林镇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从宋代起，便一直与“茂林吴”联系在一起。茂林吴姓人聚族而居的一个巨大的村落在茂林吴村。茂林吴氏初称“泾川吴氏”，是黄帝至周族部落领袖古公覃父的姬姓的一脉，传至18世是吴王寿梦。传说北宋熙宁间，家住东庄湾（今乔吴）的吴安国娶了河西的宋氏女为妻，便搬到宋家坦与宋氏“联居”，熙宁乙卯年（1075）建成一座住屋，名“延陵新宅”，并在屋后栽下了三棵紫荆树。后来，这三棵紫荆树竟然活了900年左右，成了吴氏宗族繁荣昌盛的象征。明代晚期，延陵新宅可能已经不存在了，于是吴氏宗族就在紫荆树边建造了一座规模宏伟的吴氏大宗祠。明代吴氏族人吴仲文有诗道：“希贤来往汇山下，安国移居植紫荆，后于荣四恢宏业，宋家坦改茂林

村。”诗中的“汇山”是魁峰的旧名，汇山下即今乔吴村。

往事越千年，沧桑已巨变。抗日风云激荡的1938年5月，新四军在革命老区茂林建立了“茂林工作队”，成立的“中共茂林区委”活跃在茂林全境。1941年，发生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，第一枪就在属茂林永定乡的不岭打响，事变以“皖南”而命名，因发生在茂林，这个地方开始被世人知晓。

茂林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从前有人说，走进茂林村能听到“三声”：一是婴儿的啼哭声；二是学童的读书声；三是纺织机杼声。这三声是茂林人丁兴旺、求学上进、辛勤劳动的标志。地处徽州地区的茂林历来重视教育，基础教育普遍率颇高。有官办的“社学”，大小公堂办的“义学”，以及私人办的“私塾”。各类学校都邀请饱学之士执教，学童们完成启蒙教育之后升入“经学”，攻读“四书五经”、“诸子百家”。学而优者经过考试成为“县学”、“府学”的生员，再去攀登“乡试”、“会试”的阶梯。崇尚读书的良好社会风气形成后，大大促进了古代茂林的经济发展和繁荣，为茂林成为“商宦社会”打下了基础。清代的大学士、大书法家刘墉书赠族人曰：“荆树有花兄弟乐，书田无涯子孙耕。”此言很好地形容了当地的耕读文化。

“学而优则仕”，明清两朝，茂林不少的村民经商致富，出仕为官的人也不断增多。茂林共出进士19人、举人119人，到了清朝中期形成了占地三四平方公里的大村落，富商的豪宅鳞次栉比，职官品第比比皆是，共有广厦数千间，有“江南第一村”的美誉。明代中叶起至清嘉庆时，茂林吴氏有很多人远贾他乡，在长江、淮河两大流域定居、繁衍后代，有的成为当地的望族。如无为吴氏，人才辈出，明末兵部侍郎吴光义曾访故里，自称侨居无为。旧时的人们常说“小小泾县城，大大茂林村”。其实，泾县在皖南山区的县城并不算小，说它小，只是为了形容茂林村的大。明左都御史李帮华有诗为证：“延陵望族传江左，荆里名家落水西。”由此可见茂林当时的繁华。

地杰人灵的茂林走出了众多的时代俊才。清吏部尚书吴芳培曾获“写作俱佳、可云好学”的嘉奖；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兼漕运总督时，曾因在位期间十年无患，“清淮士民，称颂不衰”，而得道光帝御书六个“福”字赏赐。近代为爱国统一战线

作出卓越贡献的吴茂荪、经济学家吴半农(吴组缃大哥)、曾任财政部长的吴波都是茂林人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、学者吴组缃与大画家吴作人、著名书法家吴玉如并称为“茂林三吴”,更是代表了现代茂林达到的文化高度。

下面,就让我们走进吴组缃这位“皖南乡村之子”丰富多彩的人生。

二 家世与青少年时代

吴组缃是茂林吴姓“前分”人,系“绿野堂”七房后裔。按吴氏宗谱所载,吴组缃的祖父吴季萃,字耕伊,在南陵县青弋江一家油坊做“管事”。吴组缃的父亲吴庆余(1886—1928),字吉孚,自幼喜欢读书,后来考上了秀才。清末时期,受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影响,曾多次出任文案,一度出任皖督及袁世凯的文案。在任袁世凯的文案期间,由于不满袁世凯称帝,吴吉孚毅然辞去职务,返回故里茂林。不久就弃儒从商,积累了一些财富后,用其中的一部分开始兴办学校。吴吉孚的后半生就在忙忙碌碌地兴办学校中度过。1918年,年仅32岁的吴吉孚就创办了“育英小学”,开茂林办新学之先声。1908年,吴组缃出生了,至今,吴组缃出生地——“七房”大夫第傍的一座古宅尚在,虽只剩断壁残垣,却依稀可见他父亲吴吉孚奋斗半生积累的财富。

尽管晚年的吴组缃自豪地称道他的家乡茂林山清水秀,但整个徽州地区严酷的生存环境还是在他的童年埋下了阴影。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很快就波及中国,当时政府又腐败无能,进而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崩溃。皖南一带许多靠经商而家境殷实的商贾们均濒临破产的边缘,许多店铺纷纷倒闭。本来尚称小康的吴家,也未能幸免。受到了沉重打击的吴吉孚忧郁致死,年仅42岁。

虽然家道中落,少年时期的吴组缃还是快乐的。受父亲影响,他从小就读于私塾和父亲创办的育英小学,非常喜欢读书。在1921年离开家乡前的十几年间,家乡的皖南风光曾让少年

时期的吴组缃浸染了浓厚的乡土气息。后来,他又先后在宣城省立第八中学和芜湖省立第五中学读书,听过恽代英等人的讲演,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。以后转学到南京新民中学,1925年转入上海持志大学中文系。其间辍学年余,回茂林同沈菽园女士结婚,在养正、福群小学任教员。看到学校教学设施陈旧,关心家乡发展的夫妻俩就将工资捐给学校购买教学用具。

吴组缃多次说过:“我是个乡下人。”他对故土、对乡村,始终怀着很深厚的感情,离开家乡后共有三次回到茂林。第一次是在1962年,合肥师范学院邀请他回皖讲学,他做了四大名著的专题演讲,场场爆满,座无虚席,礼堂的窗外也挤满了观众,深受好评。1980年6月,吴组缃南到上海、南京开会和讲学。这期间,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再次邀请他到校讲学。派人专程去南京接他来芜湖时,他告诉接他的人说,已经有40年没有回家了。他要求活动告一段落后,去泾县茂林看看。在回家的路上,吴组缃异常兴奋,指认着故乡的山川风物,感慨万千。有时路遇老人,他便叫车停下来,询问故乡今昔的不同。故乡变化太大,难免引起沧桑之感。

1988年,吴组缃最后一次回到茂林。此时的他已经八十高龄了,在沈天佑的陪同下,赴当年的中国《红楼梦》学会。为了表示对故乡人民的关心和眷恋,他带来了长期节衣缩食积蓄的1万元钱,捐给茂林小学。在茂林镇举行的座谈会上,他说:“我很惭愧,茂林人把我养大,让我受到了教育。但在茂林最困难的时候,我跑得帽顶子不见帽影子。我现在回来了,对茂林没有贡献,一点小意思,拿不出手,表示一点心意。”他说:“我在北大教书,每年高考之后我会去翻新生名册,希望有茂林的学生上北大念书。”他告诫家乡人不要妄自菲薄,要有奋发进取的精神:“这次回家乡我想说一句话,我们这辈子人,也不比别的地方的人差。如后岸的王稼祥,南容的李紫翔,都做过一番大事业。我小时候的同学人数很多,也有很突出的如吴作民。我写作文,开头‘人生在世’,后面不知写什么了。而吴作民一写就七八页,洋洋洒洒,我佩服得不得了。”他与陪同他去拜谒父母坟墓的沈天佑说:“要是我年轻十岁年纪,就退休到茂林来

住，每天来看看父母坟墓，在松树下读书。”^①浓厚的乡情溢于言表。

茂林独特的人文自然环境孕育了吴组缃的文学才情，而皖南乡村的世态人情更是成为他后来创作的素材和灵感之源。这位从茂林走出来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，用一支生花妙笔，书写和描摹了皖南乡村的丹青画卷，表达了这位皖南乡村之子对故乡挥之不去的深情。

三 求学路上的良师益友

1929年，在家乡养正、福群小学任教员的吴组缃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。他考入清华大学，先是就读于经济系，1933年升入清华研究院，转而专攻中国文学。这之前，在宣城、芜湖、南京上中学时，他就开始了小说、散文创作。进入清华后，吴组缃取材于家乡，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作品。其中，代表性的有《官官的补品》、《箴竹山房》、《一千八百担》、《天下太平》和《樊家铺》等短篇小说，其中的方言土语、生活习俗都体现出皖南独特的乡土气。纵观同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者们，鲁迅着力写他的绍兴地方的农民生活，沈从文对湘西民风民俗描写得入木三分，而写安徽皖南民风的吴组缃，其性格中则沾染着皖南的青山秀水。生活中的吴组缃，有“真话说到底”的淳朴个性，这在他求学时期就已经初现端倪。

在清华读书期间，吴组缃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。早年在清华大学文学院读书时，他就在旧书摊上买了一本《儒林外史》，开始细读精批。吴组缃10岁就在父亲所创办的育英小学读书，自小就接受系统而严格的古典文化的教育，并懂得从中汲取精华。吴组缃幼小时受的教育是传统的封建启蒙教育。他很早就对古典小说产生浓厚的兴趣，这也使他接受古典白话小说更为直接和容易。他曾在《漫谈红楼梦亚东本、

^① 葛兆珩：《最后一次家乡行》，《吴组缃先生纪念集》，第296—297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。

传抄本、读书》中回忆古代小说对他的影响：“我们不是为小说的内容所吸引，而是从它学做白话文。”因此，他的小说也着重于对古典意境、物化象征的追求，像《蓁竹山房》气氛怪异、鬼气森森的意境，《黄昏》中鲜明而独特的抒情化色彩等，体现了现代小说创作对古代小说技巧的借鉴和吸收。

在清华读书期间，吴组缃结识了一帮文友，并与他们结下了一生的友谊。当时，他与同在清华求学、后来都成为著名学者和作家的林庚、李长之、季羨林相交甚密，被戏称为清华园“四剑客”。季羨林在吴组缃逝世后曾深情回忆道：“距今 64 年以前，在 30 年代的第一年，我就认识了组缃，当时我们都在清华大学读书。岁数相差 3 岁，级别相差两级，又不是一个系。然而，不知怎么一来，我们竟认识了，而且成了好友。当时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林庚和李长之，可以说是清华园‘四剑客’。大概我们都是所谓‘文学青年’，都爱好舞笔弄墨，共同的爱好把我们聚拢在一起来了……我们‘四剑客’是常常会面的，有时候在荷花池旁，有时候在林荫道上，更多的时候是在某一个人的宿舍里。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，我的岁数最小，还不到 20 岁，正是幻想特别多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仿佛前面的路上全铺满了玫瑰花的年龄。我们放言高论，无话不谈。‘语不惊人死不休’。个个都吹自己的文章写得好，不是梦笔生花，就是神来之笔。”^①

吴组缃与后来闻名中外的钱钟书既是同窗，亦是诤友。1989 年 5 月 2 日，吴组缃在一次接受采访中，这样描绘与同窗钱钟书的关系：“钱钟书与我只是普通同学，我们都晓得他是个‘书虫’。”吴组缃很佩服钱钟书的读书功力，他说：“我常常到他屋子里去，他的笔记本有这样一大摞。”“钱钟书会说，喜欢与人聊天。不过一般人他看不上，不理你。那时清华有个学生很特殊，搞地质的，个子特别矮，坐在马桶上，脚落不到地，叫徐元配（音）。钱先生最喜欢与他聊，吃饭时也在一块聊，没完没了。现在，钱先生与周振甫先生就是这样的关系。一般人同他也聊不起来，同我就聊不起来，因为钱先生太博雅。”“清华不分班、

^① 季羨林：《悼组缃》，《吴组缃先生纪念集》，第 11 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。

系,来往都很亲密。4月1号起咖啡室开门。我们下午打过球洗过澡后,就去喝咖啡、酸梅汤、红茶,吃点心。钱钟书在我们同学里很出名,读书博得很。赵万里当时25岁,给我们讲版本目录学。一次他说:不是吹牛,某书版本只有我见过。课后有两个学生都讲:不是那回事情呀,只有他见过吗?我们也见过呀,而且同他介绍的就大不一样。这两个学生就是钱钟书与吴晗。”吴组缃接着说:“钱钟书表示,那个版本他见过许多次,同赵万里讲的不一样。我从中调拨,‘下一次你站出来讲嘛,难道咱们清华无人了?’我很佩服赵万里!本来,他计划讲十个题目。第一个题目落下这个笑话后,他留下七八个题目真个就请钱钟书和吴晗讲。赵万里的学问很了不起,可钱、吴能给他挑错儿。”

钱钟书也喜欢作弄吴组缃,新中国成立后,钱几次问吴:“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?”吴组缃不知道,只得老实地说“不知道”。每每想起这段,吴组缃先生都哈哈大笑。

1979年5月9日,一位海外学者向钱钟书问到吴组缃。钱先生表示过他们的同学关系后说:“吴组缃是一位相当谨严的作家,对于写作一事,始终觉得力不从心,所以自从《鸭嘴涝》(后来经老舍先生建议,改名《山洪》)出版后便搁笔了。”在一次同学会上,两位八旬的老人拥抱在一起,吴说:“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,就是没有自己。”事后钱钟书并不服气,寄了一套《管锥编》给吴组缃,说道:“我的书,你都没有读懂!”从吴组缃对于文友名著的批评可见他特立的品格。在钱钟书先生及《围城》最走红的时候,吴组缃却逆风挑刺,说:《围城》不过是教授小说,用力学《儒林外史》的讽刺罢了,作者生活圈子狭窄,不宜过高评价。操着皖南口音的吴组缃显然串了不少调儿,但批评起钱钟书的书来却仿佛小锤敲老钟,底气十足。

但是,吴组缃在内心对钱钟书还是很佩服的。他曾感慨地说:“1933年毕业后,伦敦大学请钱先生讲英国文学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在英国讲英国文学,一般人岂非班门弄斧?”吴组缃在对钱钟书的叙述中流露出了拳拳的真挚情感,两人的同窗

之谊，让人羡慕。^①

吴组缃在清华中文系读书时曾编辑过学校文艺刊物，与当时在清华读书的曹禺有过接触。谈起他与曹禺的过往，吴组缃曾回忆道：1932年至1933年间，他二十四五岁，因安徽泾县老家有妻女，经济拮据，在清华读书时就写些小说糊口。后来，小说《官官的补品》、《箴竹山房》等一炮打响，吴组缃有了点名气，便被聘做《清华周刊》文艺栏主任、《清华年刊》主编。别人告诉他，有一个长头发的青年叫万家宝，是西洋文学系的学生，常闷在图书馆里埋头写东西。于是吴组缃便找万家宝约稿，万家宝却推辞，只是说：“没有，没有。”有一次，吴组缃和挚友林庚（北大中文系教授，著名诗人、学者）一起再去万家宝的宿舍约稿，刚推门，只见万家宝坐在地板上，头发披散，床铺上乱堆着正在写的稿纸，一只瓷器观音被摔碎在地上。吴组缃和林庚见此情景，赶紧轻轻掩上门离去。当时，吴组缃先生不知道万家宝带着如此愤激的情绪在写什么。1934年7月，《雷雨》在巴金、靳以等编辑的《文学季刊》上发表后，才知道他写的是《雷雨》。吴先生说，《雷雨》发表后，没有什么影响，一年间没有上舞台，知道曹禺的人也不多。而自己因为在1934年有《一千八百担》、《樊家铺》等作品在《文学季刊》上发表，短篇小说集《西柳集》出版，茅盾给予评论，鲁迅、茅盾推荐他的《一千八百担》给美国人译介，冯玉祥在1935年初聘他担任自己的私人国文教师，名气要比曹禺大。吴组缃说，事隔一年，曹禺名气突然大了。1935年4月，《雷雨》被几个生活在中国的日本文学青年带到日本，由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公开上演，当时日本著名的戏剧家秋田雨雀给演出提供了很多帮助。关于中国留日学生上演《雷雨》的事，日本报纸有报道，中国上海的《申报》等也作了报道。后来，《雷雨》由日本传到国内，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演出《雷雨》，许多大报纸都辟专栏评论《雷雨》，曹禺不得了了，由默默无闻一跃而为一个真正的大作家。而后来，两人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^②

① 钱文辉：《听吴组缃先生谈曹禺》，《百年潮》2000年第7期。

② 钱文辉：《听吴组缃先生谈曹禺》，《百年潮》2000年第7期。

吴组缃与茅盾也是亦师亦友。吴组缃属于在“五四”新思潮影响和启迪之下,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代知识分子。他的创作放眼于整个时代与社会,早在 30 年代就写出了一系列与左翼作家作品相一致的好作品。1934 年,茅盾便惊喜地指出,“这位作者真是一支生力军”。这一时期,吴组缃的小说创作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:在创作观念上偏爱客观写实。茅盾评价他“是一位非常忠实的用严肃眼光去看人生的作家,他没有真实体验到的人生,他不轻易落笔”,甚至还不无偏激地认为,“吴先生的写作态度是非常客观的,然而有时太客观”。^① 其实,抛开当时文坛普遍对“纯客观”的批评误会(连鲁迅也受过类似指责),吴组缃的“纯客观”才是真正意义的客观。因为按照现代小说理论,吴组缃小说的“故事是经过精心组织而成为完整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情感体验”。^② 它恰当地把握了情节性与生活化的关系。熟悉吴组缃性格的人都知道,他对自己的创作是近乎苛刻和严厉的。“宁可少些,但要好些”,这是他的创作原则。他基本上是用治学的态度来进行他的小说实验和探索,相当审慎虔诚,虽然产量少,但是质量均衡,不求其多,但求其好。而且为了贯彻这一严谨的态度,他的小说在表现社会现实角度方面,喜欢截取一个生活片段作速写式描写。吴组缃在文学创作上虽然受到茅盾的影响与推荐,但他并不完全认同茅盾。他多次谈到茅盾的《子夜》、《春蚕》等小说存在严谨客观方面的缺陷。对于茅盾的小说《春蚕》,吴组缃认为其存在严重失误。但他对茅盾始终是怀着敬意的,从他写的散文《雁冰先生印象记》就可以看出。他在文章的结尾深情地赞扬茅盾:“他不是那庙堂之器,他也不要作那种俨然人师和泥胎偶像。他只是个辛勤劳苦的,仁慈宽和的,中国新文学的老长年和老保姆啊!”

① 茅盾:《〈西柳集〉书评》,《文学》,1934 年。

② [法]利昂·塞米利安:《现代小说美学》,宋协立译,第 122 页,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。

四 当上了冯玉祥的国文教师

翻开民国史，冯玉祥将军算得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。他出身贫寒，从士兵做起，一直干到统率几十万兵马的集团军总司令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，成为蒋介石的结拜大哥。从平民到将军、元帅，说起来，有他这种经历的历史人物，古今中外，并不少见。然而，像他那样始终保持平民本色，以“丘八”为荣，布衣布鞋，朴素终生的人，可谓凤毛麟角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冯玉祥将军只读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书，算起来小学都没有毕业。但他身边的秘书却个个是学贯中西，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其中不乏大学教授、学者名流，论学识水准，均堪称国内一流。

吴组缃先生就是其中之一。1935年1月，从清华毕业，在南京“中央研究院”任职的吴组缃，有缘与冯玉祥结识，并出任冯玉祥的国文教师和秘书长长达13年之久，开启了自己人生的崭新一页。作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社会剖析派的重要作家之一，吴组缃在这一时期已经小有名气了，他创作出许多反映中国农村破产的小说以及散文，因此得以与时任国民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相识。提起这段过往，吴组缃说：“冯玉祥爱国、主张抗日，拥护共产党，很了不起。他是《三国演义》的信徒，学刘备三顾茅庐，尊重知识分子。他看过我的作品，请我去当国文教员。”

正由于冯玉祥尊重知识、尊重知识分子，吴组缃才做了他的国文老师。曾做过冯玉祥机要秘书的王倬如回忆道：“冯先生治军的严格是出了名的，跟随他多年的部下，有的成了师长、军长、司令，一旦犯下大错，弄不好还会被他喝令拖出去打军棍。但是，冯先生对身边的工作人员，尤其是对文化人，却总是客客气气。”冯玉祥几次隐居泰山，并在泰山建立了研究室，研究国内外政治、经济。在泰山，他认真读书，探求真理，由于读书时间、地点相对集中，不同于以往戎马倥偬中的自学为主，对他的思想转变至关重要，最终使他“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